

从手机通讯功能使用现状看 现代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基于2009年成都市手机调查的实证研究

刘 伟

摘 要：基于对2009年成都市手机调查的数据分析，以社会关系中的人际交往为研究议题，通过对成都市城乡居民手机通讯功能使用现状的描述，探究人际关系中“差序格局”^①的现状及其新的变化，以及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在个体人际交往中所发挥的功能。研究发现，尽管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成都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传统“差序格局”的模式并未发生“被动地”改变，而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为个体以“差序格局”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提供了自主空间；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将决定手机人际交往工具性的发挥。

关键词：手机；手机通讯功能；人际交往；差序格局

作者简介：刘伟，男，社会学硕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71）

中图分类号：C91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2-0123-06

从只有少数人消费得起的“大哥大”到几乎人手拥有一部，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完成了从个别“社会现象”到进入百姓日常“社会生活”的普及过程。作为高科技产物，相较于信件电报、座机电话、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工具等其他通讯工具而言，手机不仅在通讯功能上有独特、无法替代的优势，还集合了众多“非通讯性”功能。而对手机多重功能的使用，似乎也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标志。^[1]这些功能的发明与使用，令手机逐渐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因此，手机可被看成“社会生活方式现状”的深度观察媒介。

一、研究目的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手机对个体人际关系的影响是通过手机与个体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来的。对手机功能的使用，除了可以呈现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现状外，还在不断地影响着个体对人际关系的建构行为。换句话说，手机对人际关系的嵌入性，使得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有了新的准则与新的行动方式。^[2]

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人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因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由紧密到疏远地进行人际交往的人际关系格局。^[3]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城市，人们对生活环境的人和物趋于陌生。而社会流动的增强，使得血缘亲朋之间因为居住距离拉大而联系变少。而人与人交往的匿名性，使得往往同一屋檐下的邻居会成为陌生人。人们常常感觉到人情冷漠、人际关系淡漠，“差序格局”似乎正被打破。

人们关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思考更多基于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个体而言似乎是

① “差序格局”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指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纵向上以亲属关系为主轴形成序，横向上以自我为中心、依个体关系亲疏远近而形成差，而结成的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格局。

被动的。但手机作为一种嵌入人际关系的通讯工具，恰恰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更加灵活自主的选择空间。笔者认为，个体“以己为中心”的人际交往方式其实并未改变，如果能尊重个体的意愿，中国人更愿意选择依亲属圈、朋友圈、工作圈而交往逐层变淡的交往格局。而手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个体自主选择工具。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成都市城乡居民手机通讯功能使用现状的描述，探究人际关系中“差距格局”的现状及其新的变化，以及手机作为通讯工具，究竟在个体的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如何。

二、样本获取与数据说明

本次调查在成都市市区及周边区县展开，采取 PPS 抽样方式获取样本。在隶属成都市区的五城区样本抽取时，并没有选择区，而是直接抽取到街道，调查对象为市民；成都市郊区仅选择了龙泉驿区一个区，调查对象为村民。村民与市民的抽取比例根据成都市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确定。最终，成都市调查共计 800 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中，男性 368 人，占 46.00%；女性 432 人，占 54.00%。调查未成功 161 人，成功率为 83.25%。

三、手机通讯功能与个体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

手机的通讯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话，该方式简便快捷。二是手机短信，但发短信要求使用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手机使用者依据这种通讯功能上的差异，根据具体需求选择不同的通讯方式。

首先，个体的手机通讯联系频次与“差序格局”相符合。如表 1 所示，考虑到个人联系的范围与程度不同，我们调查中请每个调查对象列举自己联系较多的 6 个人。根据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可将个体最常联系的人际交往对象分为三大类：一是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对象，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和亲戚。从表 1 中可以读出，在使用手机联络时，与个体具有姻缘及直系血缘关系（配偶、父母、子女）的联络频次占到了 42.49%，另外，“亲戚”也占到了 11.32%。换句话说，使用手机时，有一半以上的“联系”都发生在对血缘、姻缘的亲密人际关系上。其次为有较多私人互动关系的“朋友同学、老乡和恋人”，这一比例占 25.15%。之后是工作关系，主要包括了同事、领导、下属和客户，这种联系仅占 19.9%。因此，经由手机通讯建立联系的对象中，“亲属关系圈”的联络超过了一半，稳居第一位，其次是“朋友关系圈”，而实际的“工作关系圈”只是占到了较小的比例。这同传统的“差序格局”十分吻合。

表 1 被调查者经常使用手机联系的对象情况表（单位：人次/%）

与本人联系	人 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配 偶	323	16.78	16.78
父 母	269	13.97	30.75
子 女	226	11.74	42.49
亲 戚	218	11.32	53.82
朋友同学	414	21.51	75.32
同 事	255	13.25	88.57
上 司	48	2.49	91.06
下 属	9	0.47	91.53
客 户	71	3.69	95.22

与本人联系	人 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恋 人	34	1. 77	96. 99
老 乡	36	1. 87	98. 86
其 他	22	1. 14	100. 00
总 计	1, 925	100. 00	

其次，个体依不同对象使用不同通讯方式的情况，也反映出人际关系的亲疏依然遵循着差序格局。从表 2 不难看出，个体同配偶、父母、子女以及亲戚都保持了较高的通话比例。而朋友同学和上司的通话比例相对较低（因为下属、老乡和其他均不满 10 人，所以在分析中不考虑这些人）。在与配偶、父母联系时有 1/3 的人会直接通话，使用短信的比例在 1/5 左右。与子女联系中超过一半的人直接通话，而使用短信的比例尚未达到 10%。另一个方面来说，通话与短信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选择的联系方式也是不同的。如果从工作关系看，在个体同上司、同事、客户的联系中，电话通话的比例虽依然较高，但短信的方式也有较高的比例，只是短信与通话差不多的情况明显减少。

在不同对象间使用通话或短信的不同方式，可体现出人际交往的联系准则和关系远近的差别。在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中，联系往往比较直接，较少出于客套的交往程序，许多事情可以直接说出来，也不需要进入交往前的引导程序，交谈不必考虑适当与否，因此会通话较多而短信较少。相反，朋友、同事间的关系为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联系时需要体现客套的联系规则。一次通话中通常有：客套的问候交谈+正式事情的联系+结束时的告别等环节。如果在通话过程中缺少了前后两个环节，就会显得个人“办事”没有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相对于一次正式的通话，短信则可以无需直面客套与繁琐的人际交流环节，且时间灵活，直接说出事情，无需有过多交往前的引导程序。这使得短信在个体同非血缘、姻缘关系的联系对象交流时更受欢迎。如果这种判断成立，短信则成为维系较疏远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有效的工具。随着使用的频率增多，个人间的通讯联系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自身的联系惯性，从而导致了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间采取了不同的联系方式。

表 2 被调查者使用不同联系方式与通讯对象交流情况表（单位：人次/%）

与本人关系		电 话	短 信	两者相同	合 计
配 偶	人 次	105	52	151	308
	百分比	34. 09	16. 88	49. 03	100. 00
父 母	人 次	77	52	110	239
	百分比	32. 22	21. 76	46. 03	100. 00
子 女	人 次	104	20	81	205
	百分比	50. 73	9. 76	39. 51	100. 00
亲 戚	人 次	57	21	58	136
	百分比	41. 91	15. 44	42. 65	100. 00
朋友同学	人 次	73	46	111	230
	百分比	31. 74	20. 00	48. 26	100. 00
同 事	人 次	27	26	52	105
	百分比	25. 71	24. 76	49. 52	100. 00
上 司	人 次	8	4	5	17
	百分比	47. 06	23. 53	29. 41	100. 00

与本人关系		电 话	短 信	两者相同	合 计
下 属	人 次	1	1	0	2
	百分比	50.00	50.00	0.00	100.00
客 户	人 次	10	10	8	28
	百分比	35.71	35.71	28.57	100.00
恋 人	人 次	4	2	7	13
	百分比	30.77	15.38	53.85	100.00
老 乡	人 次	3	1	0	4
	百分比	75.00	25.00	0.00	100.00
其 他	人 次	2	1	4	7
	百分比	28.57	14.29	57.14	100.00
总 计	人 次	471	236	587	1,294
	百分比	36.40	18.24	45.36	100.00

从联系方式来看，手机嵌入到人际关系中最多部分，依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圈”。其次为社会交往的“朋友关系圈”，然后才是“工作关系圈”。在这些关系中，由于联系的目的不同，有些是出于情感的联系，有些是出于利益的联系，因此必然会有不同的交往规则。但无论如何，个体交往中的差序格局依然清晰可见。

再次，手机通讯，有助于拉近“差距格局”中较远距离的社会关系。诚如前文所述，在个体使用手机联络的对象中，处于“工作关系圈”的联络对象的整体数量是较少的。但一旦个体选择了运用手机同相对较远圈层（“朋友关系圈”“工作关系圈”）的对象产生联系时，其联系次数明显高于同“亲属关系圈”的联系频率。这说明，尽管联络对象的数量总体较少，但一旦使用了手机通讯发生联络，个体同差距格局中较远圈层的对象的人际关系将会被拉近。

如表 3 所示。首先，从血缘、姻缘关系的范围看，配偶的通话频率最高，其次是子女，然后就是父母与亲戚的通话频率。在亲属范畴内的这种通话频率的差别与家庭的“差序格局”具有十分相似性。其次，在选择了通过手机与朋友同学、同事联络的人群中，通话频率均略高于配偶。再次，在选择了用手机同客户和恋人进行联络时，其通话频率也都高于配偶。但不能否认，这些高频率通话，有利于促进相互间关系的维持，具有一定的功利性。特别值得注意，客户和恋人较朋友同学、同事关系更不稳定。显然，如果没有频繁的联系，客户会流失，与恋人之间的感情会淡化。

另外，被调查者中，认为与客户、恋人关系“增多了很多”的分别占到总体的 60.00%和 61.76%，而认为与子女和亲戚关系“增多了很多”的人分别只有 29.15%和 26.15%，66.67%的人认为与下属的关系“没有变化”，几乎没有人认为使用手机后联系减少。很显然手机在嵌入人际关系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从这种联系的对象与频率的差异可以看到，手机在嵌入原有的较密切的人际关系时，基本不会改变原有的人际关系结构。但对于非天然关系的人来说，手机却是增强联系的有效工具，特别体现在与客户、恋人的关系上。这些关系是后天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维系与巩固都需要通过较多的联系达到沟通的目标。而且这些关系如果没有足够的联系就可能流失，对于个人来说，这种关系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客户是工作上的重要资源，客户的流失就意味着利益的损失，所以维持与客户的联系对于个人的工作来说十分重要。因此，维持客户的关系就必然需要有更多的联系，手机提供了最方便的方式。从而可以看到客户的联系频率很高。恋人则是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对象，恋人的流失就意味着婚姻过程可能会失败，所以也需要投入较多的联系来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这说明手机在这种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上，不仅是简单地增加一种联系方式，而且成为巩固这种关系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手机不仅是简单的工具，更是新建人际关系的渠道，有助于拉近“差距格局”

中较远距离的社会关系。

表 3 不同联系对象的每天平均通话次数（单位：次）

与本人关系	平均次数	标准差	人 数
配 偶	1. 82	1. 02	322
父 母	1. 39	0. 83	266
子 女	1. 43	0. 78	224
亲 戚	1. 35	0. 75	216
朋友同学	1. 83	1. 37	413
同 事	1. 84	1. 05	254
上 司	1. 49	0. 75	47
下 属	1. 67	1. 00	9
客 户	2. 76	1. 90	70
恋 人	3. 24	2. 13	34
老 乡	1. 42	0. 81	36
其 他	2. 05	1. 33	22
总 计	1. 71	1. 16	1913

综上所述，如果说现代社会人际交往趋于功利、人情趋于淡漠的话，手机作为一种为现代社会个体提供自由交往便利的通讯工具，正影响着个体的人际交往。而本研究的调查数据对个体人际交往功利、冷漠的说法做了一次澄清。显而易见，以“己为中心”，以亲属圈、朋友圈、工作圈逐级“推开”的交往半径所构成的“差序格局”并没有改变，只要提供给个体机会与工具，个体都会遵循这样的人际交往路径。另一方面，手机亦为个体交往提供了新的工具性的可能，因为有了手机，个人可以通过增加联络频次的方式，对差序格局中“水波外围”的非天然但却于己重要的社会关系加以巩固与维系，从这一意义上说，以己为中心的交往方式未曾改变。总的来说，手机一方面巩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人交往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又为个体因需要而建立新人际关系提供了工具。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出现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瓦解，现代社会人际交往冷漠、功利的状况。

四、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决定手机人际交往工具功能的发挥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面，而手机是面对面人际交往方式的延展。^[4]手机工具性的发挥，可通过人们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中是否会充分利用手机来判断。如果个体认为可以将初识者逐步强化成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组成部分，会倾向于告之自己的手机号码，以获得建立直接人际关系的机会；而个体若留下其他联系方式，如家庭电话、办公电话、甚至留虚假电话，甚至不留电话，则表示其并没有与初识者建立紧密人际关系的愿望。如表 4 所示，成都市对于初认识者留下手机号码的被调查者占 74. 03%，而留下固定电话的仅 5. 83%，不留电话的占 20. 14%。这说明更多人在同初识者结识之后，希望建立更进一步的人际关系。而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显然对于这种人际关系的建立需求不同。同样如表 4 所示，在初次见面便留手机号的被调查者主要为 45 岁以下的年轻人，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留手机号的不到 60%。老年人希望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需求低于年轻人，特别是退出了工作岗位后，这种联系仅仅限于情感的联系时，建立更加频繁的亲密联系的需求明显减少。这种建立联系的选择方式，也说明了手机是用于巩固初步建立的非亲属联系的重要方式。原有的亲属联系并没有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而且尽管许多都将亲属关系列为手机联系的重要对象，但真正使用手机联系的频率却并不高。这说明了手机在不同的对象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所以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这种使用手机联系的需求也体现出了差异。

表 4 被调查者中不同年龄组为新结识对象留通讯方式的情况表（单位：人次/%）

留电话号码		19-25 岁	26-45 岁	46-60 岁	60 岁以上	总 计
家庭电话	人 次	2	4	6	5	17
	百分比	2. 56	1. 35	4. 29	9. 62	3. 00
手机号	人 次	57	232	99	31	419
	百分比	73. 08	78. 38	70. 71	59. 62	74. 03
办公电话	人 次	2	14	0	0	16
	百分比	2. 56	4. 73	0. 00	0. 00	2. 83
虚假电话号码	人 次	4	12	2	0	18
	百分比	5. 13	4. 05	1. 43	0. 00	3. 18
不留号码	人 次	12	32	31	16	91
	百分比	15. 38	10. 81	22. 14	30. 77	16. 08
其 他	人 次	1	2	2	0	5
	百分比	1. 28	0. 68	1. 43	0. 00	0. 88
总 计	人 次	78	296	140	52	566
	百分比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从这个角度看，手机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工具，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使用者的态度。并非所有的手机使用者都希望加强个人的人际关系。当个人对于人际关系的需求和关系的认识态度不同时，手机增强人际关系的工具性功能是不同的。如果个人需要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从而拓展个人的社会关系时，手机就能发挥这种人际交往的工具功能。如果本人并不期望建立和扩展个人的社会关系，手机在通讯功能上，更多的将是固定电话的替代品。他们既不会将手机号码告诉给新认识的人，也不会感觉手机会扩大和加深人际关系的联系，甚至认为手机削弱了人际间的交往。这与那些将手机当成扩大和加深人际关系的个人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很显然，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与态度呈现了分化。但不论怎样，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决定了手机人际交往工具功能的发挥。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手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个体人际交往的必需品，从而嵌入到社会人际关系中，主要因为手机是人际交往的“自主工具”，因为有了手机，人际交往对象、人际交往频率可以尽量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自主进行。我们发现，就成都的情况来说，即便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人们对传统“差距格局”式的人际交往方式依然具有高度的认同性。而正是因为有了手机，这种富于人情味的交往路径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巩固甚至重构，这体现的是手机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与此同时，手机更是从满足不同群体对于新人际关系建立的需求的角度，反映着现代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建立人际关系的不同需求，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决定手机人际交往工具的功能的发挥。在成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青年与中老年在人际交往的需求上，明显高于青少年和老年人。而这一需求得以满足更进一步说明了现代人在工作与学习中对手机的依赖。

参考文献：

[1] 周芸．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 [J]．兰州学刊，2010（1）：77.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9.
[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30.
[4] 赵芮．论手机媒体下的人际传播 [J]．社科纵横，2007（6）：228-229.